

0252/0022 0211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论我党早期互作从互人运动 向国民革命的转变

黄修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1991年7月

内容提要 列宁曾经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在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阶段，不是象俄国等西方国家那样直接从反对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着手，而是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国民革命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已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从而“在全世界面前树起”了“可供人们用于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本文从建党前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国情的初步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任务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互作中心转到国民革命三方面，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互作中心从工人运动转向国民革命的原因、过程和意义。从党的“一大”决定以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互作中心到党的“三大”确定以国民革命为互作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互作中心的一次大转变。正是由于有了这次互作中心的转变才导致了第一项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兴起。中国共产党“三大”确定的国民革命方针，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找到了通向翻身解放的正确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胜利地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

一个半世纪前，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古老的中华大地。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和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使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难当头，出路何在？为了挽救祖国，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但都无济于事，未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中解救出来。正当许多中国人因找不到国家的出路而苦闷彷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她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在短短的两年中，经过艰苦的探索，很快就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根据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特殊国情，提出了应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1），把国民革命作为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最初阶段的中心工作，从而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攻方向。

列宁曾经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2）在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阶段，不是象俄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直接从反对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革命着手，而是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作为“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3）。这就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国民革命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已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从而“在全世界面前树起了“可供人们用于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4）。

从党的“一大”决定以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到党的“三大”确定以国民革命为工作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作中心的一次大转变。正是由于有了这次工作中心的转变才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兴起。1924年至1927年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风暴所取的巨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作中心的转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鉴于迄今为止我国报刊发表的论述党的工作中心这一次大转变的文章还很少，对它的研究也很不够，本文拟就这次工作中心转变的有关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索和阐述。

一、建党前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国情的初步认识

认识中国国情，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在党的创立时期正确地提出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决不是偶然的，是在革命实践中经过艰苦探索，对中国国情有了初步认识的结果。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进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从总体上看，中国人民并没有认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征和外国侵略者的本质，也未能看清外国侵略者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关系。这一情况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才开始改变。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这反映了当时正在崛起的中国无产阶级要求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从此以后，探索中国国情的主体和认识中国国情的方法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五四运动后，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进行社会调查，从事理论宣传，开展思想论战，从而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开始形成了对中国国情的最初的看法。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一方而对中国革命运动同世界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缺乏全面的认识，他们虽然正确地看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看成是一个同步进行的国际革命的整体；在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国的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革命势必马上进行。另一方面，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观察，只停留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和一些大城市，还没来得及转向内地和农村，因而他们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简单地纳入无产阶级与资本家对峙的公式中。所以，当时中国大多数早期共产主义者都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说：“除俄罗斯外……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国家”（5），因而主张着手“打倒资本家阶级，跟随俄国共产党试行新的生产方法”（6）。这种革命主张，既反映了他们还没有把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结构还缺乏全面的、深入的认识；也反映了他们还没有深入学习列宁的民族和殖民问题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缺乏科学的分析。党的“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加努力地去“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问题，以便“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7）。这样，随着革命实践领域的开拓，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出现了新的突破。

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当时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状态”的观点，认为“国内武人军阀横行”，“没有一丝民主的气味”，中国的政治、道德“还是旧势力占着优势”（8）。稍后，他们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身受“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双重压迫”。“1911年武昌革命事件，正是资本帝国的势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人起来直接反抗封建帝政以铲除革新障碍，间接革新内政以反抗国际资本帝国势力的外患之表现”（9）。接着，中国共产党人在1922年6月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之后，人民群众仍然没有“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中国仍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成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10）。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已不再主张在中国立即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提出应依据国内外的实际情况，逐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些观点，同中国共产党“一大”纲领、决议相比，在对国情的认识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国情作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了比过去更确切的论述。大会回顾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了构成中国社会性质的两个要素：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另一方面，“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11），这又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大会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的政治结构，

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内政治经济结构逐步演变的产物。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不仅表现在外交谈判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在中国的代理人等方面。这些分析，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

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还来不及对中国社会各种生产关系间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情况进行综合考察，还没有对中国社会经济特点和各阶级的状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也没有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基本正确的分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 and 认识国情方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进步，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作中心从工人运动转向国民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任务的艰苦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革命任务的探索与对国情的探索密不可分；对民主革命任务的探索建立在对国情探索的基础上，对国情的探索促进了对民主革命任务的探索。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人们对中国的国情和帝国主义的本质还缺乏必要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对象还没有确定的、统一的提法。当时，通常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对象。1918年12月，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写道：“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他们。”（12）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运用他们初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但是，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很有限，他们还不可能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主张把开展工人运动、反对资本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

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一件大事。大会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收地主资产阶级的机器、厂房、土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同这个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会、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毫无疑问，大会规定的奋斗目标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上述的认识也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还没有完全把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同中国社

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状态和经济结构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他们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不知道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通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加强和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国情和民主革命任务进行艰苦探索的过程中，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启示和帮助。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月革命后，列宁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刻画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后世界状况的轮廓”，指出了“目前国际形势的基础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13），拟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列宁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斗争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中世纪的残余”——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的同盟军。他说，“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14）。他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在实际上支持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运动。因为民主革命越是彻底，就越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列宁尖锐地指出，尽管民主革命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是一个“暂时和临时的任务”，但“任何忽视和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15）。在这里，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去分析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而逐渐认识到：（一）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先经过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由于中国的封建军阀和反动官僚等反革命势力只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和工具，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入手。（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中国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阶层、阶级应该联合起来，结成革命统一战线。

1922年上半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民主革命任务取得很大进展的重要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时陆续在各种会议和文件中提出来了。

1922年4月，《先驱》发表《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一文。该文在初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它明确指出：“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得到胜利，中国劳苦的群众，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

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16）。

5月1日，李大钊发表文章，把“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和“否认督军制及巡阅使制”作为“劳动界”的首要奋斗目标（17）。

5月初，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的阐述。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很多的，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认定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18）。

随后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两重压迫”，使中国农民与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处于失望之中。这份纲领把“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的奋斗目标（19）。

1922年5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这个文件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既是中国人民流离外患的根源，也是中国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不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不论是“废督裁兵”，还是“联省自治”，都是一句空话。因此，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20），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是党成立后第一次就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宣布自己政见的重要文献；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应该采取的策略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已经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指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了。

从1922年5月起，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不是本国资产阶级，而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近期的革命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族民主革命；对现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是采取“攻击、排斥”的态度，而是实行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政策了。

从党的“一大”到“二大”前夕的一年当中，中国共产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随着革命活动的开展，党的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党制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奋斗目标，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进道路。这些问题在党的“二大”上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方面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国际环境，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出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指出当时“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只要“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21），中国的内乱和战争就必然有加无已。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大会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族共和国”（22），这样，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通过党的纲领确定下来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已初步认识到，只有打碎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只有挣脱封建主义的桎梏，才能开拓社会发展的道路，当然，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这项伟大使命决非民主革命所能包含。但在实现这项伟大使命的长期斗争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却是一个必经阶段。

尽管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仍认为“切实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23），显示出这次代表大会对党的现阶段中心工作的认识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大会制定的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民主的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从工人运动转向国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作中心转到国民革命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称为国民革命。1906年，他在军政府宣言中解释说：“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24）。在这里，国民革命的含义不清，目标也不明确。党的“二大”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出了国民革命的问题，并对开展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国民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1922年9月，陈独秀在一篇题为《造国论》的文章中开始提出国民革命问题，主张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25）。1923年2月和4月，陈独秀先后发表《统一的国民运动》和《怎样打倒军阀》等文，进一步指出了开展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散漫不集中的三个运动，决不能打倒凶兽犹斗的军阀；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26）稍后，他再一次强调指出：“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

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27）

1923年5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文中分析了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区别，认为“中国革命运动之性质与历程必与从前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而国民革命的特征与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只有“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而且朝着世界革命走去，中国革命才得成功，中华民族才得解放！”（28）蔡和森对国民革命的认识，显然比陈独秀又前进了一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革命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作中心从工人运动转到国民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等问题。这次代表大会对国民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动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国民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如何开展国民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明确的阐述。

大会认为，既然“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财政、交通、工业几乎完全操纵于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有者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分，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29），既然“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30），那么在内外忧患交加的情况下，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就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以解除内外压迫。”（31）因为“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势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32）。

大会阐述了国民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国民革命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一致，共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有力部分”，“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端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行之速度。”（33）但是，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不应以国民革命“自限”，“同时须从事国民运动及阶级运动这种复杂的争斗”（34），以便为完成无产

阶级的最终使命准备条件。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同时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35）在这里，大会明确提出应以国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中心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决议和各项文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载入了党的史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由党的“一大”确定的组织、发动、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反对中外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转变为组织、发动、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这样，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三大”，经过反复探索，终于完成了党成立后工作中心的第一次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党的各项工作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从此，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人一道，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共同奋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

国民革命兴起后，自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以来暂时低落下去的工人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工会组织纷纷建立。继1924年广东沙面工人罢工之后，1925年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五卅”运动。全国有1000多万人参加了这场反帝斗争。为响应“五卅”运动，在广东爆发了省港大罢工，有25万工人参加，坚持了1年零1个月之久。与此同时，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了，除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得到很大发展外，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发展很快。其中，湖南农民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其他地方。从1926年起，一个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暴风骤雨般地开展起来了。1927年初，湖南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5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超过1000万。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猛烈冲击着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严重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为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广州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正式誓师北伐。北伐战争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北伐军的锋芒所向，势如破竹。接连占长沙、克岳阳、下武昌、取九江、攻南昌、入福州。

不到半年就打下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打垮了吴佩孚的军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力量很快就发展到了长江流域。从1912年以来统治中国十余年的北洋军阀遭到决定性的失败。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终于解放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上海，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1927年初，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把帝国主义霸占了几十年的汉口、九江租界夺了回来，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爱国主义的伟大表现，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史上的空前壮举。汹涌澎湃的国民革命浪潮，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使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国民革命兴起后，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工农运动的高涨，北伐战争的胜利，革命高潮的到来，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中心从工人运动转向国民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次符合国情的伟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将党的工作中心迅速转到国民革命，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为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近百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但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依然没有改变。历史事实清楚地证明，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客观反映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及时指明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勇敢带领全国人民从事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在“三大”确定的国民革命方针，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找到了通向翻身解放的正确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胜利地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2)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3)《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页。

- (5)陈独秀,《对于时局之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
- (6)《共产党》月刊第1号《短言》(1920年11月7日)。
- (7)《先驱》创刊号《发刊词》(1922年1月15日)。
- (8)同上。
- (9)《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 (10)《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5页。
- (1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同上书,第109页。
- (12)《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3页。
- (13)列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920年7月19日),《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7、515页。
- (14)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同上书,第275页。
- (15)《列宁全集》第9卷第71页。
- (16)《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
- (17)李大钊,《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页。
- (18)《全国劳动大会宣言》,1922年6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 (19)《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 (20)《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 (2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同上书,第111、110页。
- (22)同上书,第110页。
- (23)同上书,第78页。
- (2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6页。
- (25)陈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3月20日),第10页。
- (26)致中(独秀),《统一的国民运动》,《向导》第20期(1923年2月27日),第158页。
- (27)独秀,《怎样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第153—154页。
- (28)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第169、170页。
- (29)《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 (30)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同上书，第165页。
- (31)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同上书，第146页。
- (32)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同上书，第165页。
- (33)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同上书，第139页。
- (34) 同上书，第140、141页。
- (35)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同上书，第166页。